

国企老总月领 6800 元车补 权力岂能“自肥”

社会热点

■陆志坚

深圳国企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最近实行的车改方案:总经理每月 6800 元,副总经理每月 4800 元,部门正职与副职每月补贴分别为 3600 元、3200 元。有员工发帖说,已经远远超出 7 月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,堪称“最牛车补”。(10

月 17 日中国青年网)

月领 6800 元车补,让人讶然之后,更是羡慕国企的优厚待遇。今年 7 月,中央两办下发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》规定车补标准为:司局级每月补贴 1300 元、处级 800 元、科级及以下 500 元。虽然《指导意见》对国企没有明确车改方案,但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定应是国企车改的“坐标”,两者的补助标准绝不会像“最牛车补”那样相差 5 倍多。

而且,据有关资料显示,深圳市去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62619 元,折合成月平均工资为 5218 元。这就是说,国企老总仅月领 6800 元车补一项,就已超过当地职工的

平均工资。显然,如此畸高补贴已超出了车改范畴,变成了国企的一种变相福利,拉大了社会分配收入差距,违背了车改的初衷。

何况,就国企内部而言,如此车补也放大了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。该国企车改方案规定,总经理每月 6800 元,而普通职工仅为 300 元,近 23 倍的悬殊差距既引起了普通员工的不满,也与国企薪酬制度改革不相符,制造了新的分配不公,有权力“自肥”之嫌。

妥善处理改革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,这应是全面实行车改的重要因素。但“最牛车补”非但没有平衡国企内部、国企与社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,反而加剧和恶化了多种矛盾,这不是车改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

的目的。倘若容忍和放纵这种离谱车补的泛滥,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各项改革大局。

当然,“最牛车补”也反映出了尽快制订国企车改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目前,中央各部委的车改已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,县级车改方案规定在明年底前完成。那么,国企车改不能成遗忘的角落,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。近日,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,“对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的公车改革,要专门制订方案,适时推出,限时完成”。

我们期待国企车改方案能“限时”出台,切实规范那些高得离谱的车补。

画中有话

■谭敏

近年来,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严控会议支出,部分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做出“限星”的规定。政府的规定在酒店业界内引起了一些反应,也催生出了一些应对办法。记者调查发现,在全国多地,部分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,从“五星”变“无星”。今年以来我国“弃星”的 10 家五星级酒店中,至少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。

“八项规定”实施以来,高端白酒、豪华汽车皆因持续强力的反腐而受到影响,就连金秋十月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也因为几无官员消费,价格跌了四成,由此观之,五星级酒店受“牵连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。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,“限星”的政策对酒店打击很大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种公务消费一感冒、企业就开始打喷嚏的现象,说明了“八项规定”确实见成效。可是,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在商言商,五星酒店主动“弃星”,其反常经济行为的背后,却也提醒我们,反腐不能掉以轻心。

今年“弃星”的 10 家五星级酒店,半数以上是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。如果这些五星酒店因为主要支撑业务——公务消费的减少,而导致经营压力过大,转而主动调整市场战略,将目光投向更广大的普通消费者,俯下身段,降低价格,通过“弃星”实现由高端酒店向大众消费酒店的成功转型,或者放弃暴利,以更实惠的价格适应政府会务要求的转变,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市场起起落落,生意见机行事,本是常事。

可是,“弃星”后的酒店大多数并没有降价,仍维持高价经营。其原因耐人寻



味。很显然,五星酒店“弃星”的低调背后,并非是想转型,而是想着换个马甲,继续抱公务消费的大腿。去年 9 月底出台的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,“二、三、四类会议应当在四级以下(含四星)定点饭店召开。”可能这些五星酒店认为,只要自己的星级降下来了,就可以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换汤不换药,继续享有“三公”消费的暴利。这种想法其实与“矿泉水瓶装茅台”、“小食堂里吃鲍鱼”是一个路子,期望掩人耳目,蒙混过关。

但这种算盘恐怕难以实现,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。随着“八项规定”和“反四风”的强力推进,中央反腐决心坚定。靠公务行为支撑的高档消费市场必然无法长久。而且,在犹豫与观望期结束后,

官员也不敢顶风作案,明知“无星”后是高档消费仍心存侥幸,拿自己的位子和帽子冒险。中央和地方一个接一个的制度和条例正为各种公务消费戴上“紧箍咒”。不仅要求会议“瘦身”,能不开的会就尽量不开,能开电话会议的就开电话会议;对于会议、差旅费用的管理也日益细化和公开。以往那种一张会议费发票可以把什么消费都包进去的情况,已是难以为继了。

所以,对于曾把“三公”消费作为主要目标群体的五星酒店和其他高档消费而言,与其费尽心思打政策的擦边球,不如多想想看,如何用价格和服务赢得更多的消费者,不把“三公”消费当成唯一的稻草,而是顺应市场需求,重新定位,方是华丽转身之上策。

网络反腐 难复旧日“辉煌”

■娄士强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今日就要召开了。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到现在,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,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,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。其中人们感触最深的,无疑就是持续“打虎拍蝇”的反腐,以及以“四风”为靶标的作风建设。

在印象里,网络反腐这种“体制外”的形式,一度“风生水起”。每天刷微博、看帖子,等待网友发布曝光官员腐败的图片、视频,曾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。随着“打虎拍蝇”的持续开展,官方对腐败案件的查处,无论是力度还是速度,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。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“周一见”,成了群众获悉官员落马、了解反腐进展最重要的窗口,网络反腐已不复往日的“辉煌”。

在网络反腐的语境下,贯穿每一条腐败线索的,更像是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个人关系,要么是利益纠葛,要么是情感冲突,那些反腐的制度力量就变成了工具,被用来“精准打击”某个或某几个腐败分子。即便能够做到“举报一起、查处一起”,也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——网络举报之外存在更多的漏网之鱼。

网络反腐热度的降低,反映出制度反腐的发力,一方面,从前需要靠“炒作”才能获得重视的反腐线索,有了畅通且正规的反映渠道;另一方面,反腐体系反应更迅速、更灵敏,走在了“举报者”的前面。包括各级纪委、检察机关在内的体制内力量,真正成了反腐的主体,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”的说法,“莫伸手,伸手必被捉”的告诫,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任。

事实上,以“四风”为靶标的作风建设,也可以看做制度反腐的一部分。从“舌尖上的腐败”到“会所里的歪风”,再到聚焦形象工程,反“四风”涉及到了方方面面,对准的正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,无形中提高了对党员干部的要求。作风建设的常抓不懈,是在塑造一种标准更高、管理更严的政治伦理。身处其中的党员干部,一直感受到压力,时刻不敢放松,就更有胆量去触碰党纪国法的“高压线”了。

以往在网络反腐的线索中,很多贪官被曝光之时,腐败行为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,可以说到达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。而标准更高的政治伦理,再加上力度更大、反应更灵敏的反腐体系,恰恰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。由此不难判断,网络反腐不仅难现旧日的“辉煌”,还会持续“衰落”下去。

古代的霾背不动现代污染的黑锅

■刘昌海

日前,有媒体援引古代气象志为雾霾寻找历史依据,认为“自古有之”,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,而到了明代“每隔几年便会光临京城一次”。这篇文章给不少网友造成一种印象,即是对人类活动影响的“开脱”。而专家的意见则很一致:古代是古代,现代是现代。

霾这东西古已有之,这事儿我信。因为霾这个字并不是今天才造出来,霾这种现象也确实见诸于古时史料。不过,我们也得老老实实承认,今天的雾霾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现代的人类活动造成,是现代人类生产与生活产生的污染加剧了

雾霾天气,这实在和古代扯不上关系。

古代的霾背不动现代污染的黑锅,我们自己的责任理应由自己来负。就算是在明代的北京雾霾“每隔几年便会光临京城一次”,但现在我们的首都情况就要严重得多,两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更何况,“古已有之”并不能成为今天应该存在的理由。比如腐败,比如感冒病毒,都是“古已有之”,但我们该治还得治,听之任之就会出大事。就算是从三皇五帝的时候就天天有雾霾,这种于身体无益的现象我们也应该想办法治理。即使能找到再多的史料证明责不在己,也于事无补。

虽然雾霾历史悠久,但让雾霾登峰造极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,这是定论。是

城市在建设中对环境考虑不周,是工业生产排放过量,是农民秸秆还田时做得过于粗放,是市民生活中汽车、取暖等污染源的过多,使得雾霾来得越来越勤,规模越来越大,浓度越来越高。可以说,雾霾是人类对大自然肆意糟蹋之后,得到的大自然的小小惩罚。

如果说雾霾不断加剧是由于人类的贪婪,那么寻找“古已有之”的根据则是反映了人类的不负责任。治雾霾不能靠风,也不能怨古人。找准自己的原因,减少雾霾形成的因素,让自己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当中,于自己、于后世子孙有益。我们不能将雾霾作为遗产留给后人,否则,我们自己将来真的可能成为挨骂的古人。

**关注公检法司
维护公平正义
服务百姓生活
推进法治进程**

邮箱: zkwzbzfb@126.com zkwbghe@126.com
监督热线: 15936909988 13838686789